

陳丹燕

NON-FICTION WORK
OF
CHEN DANYAN

SHANGHAI BEAUTY

上海的

遗红
事颜

最新
修订
版

上海
三部
曲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陳丹燕

NON-FICTION WORK
OF
CHEN DANYAN

SHANGHAI BEAUTY

上海的

遗事 红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的红颜遗事/陈丹燕著;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.8

ISBN 978-7-5321-5739-6

I. ①上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2012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装帧设计: 杨 军

上海的红颜遗事

陈丹燕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67,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39-6/I·4575 定价: 3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8180628

“上海三部曲”总序

城市是个生命体，它是一个人，而不是一个物。所以，城市有自己的性格，命运，脾气，丰富的怪癖，独特的小动作，以及如同体味般，连大风也吹不掉的气味。在它身上，明亮的一面与暗黑的一面总是共存在同一处，一个街区，一条街道，一栋房子，甚至一条走廊。所以，它永远是有趣的。而且，它可以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，它有时凋败，似乎死去，但它又会适时地复活。它有时兴旺，四下欣欣向荣，处处夜夜笙歌，但它一定会在某个时代的拐角处被迎头痛击。城市总能在经历中长出新的经历，在生命中孕育出新的生命，在面容中呈现出新的容颜，真的，它好有趣。所以我喜欢观察它，描述它，看穿它，写透它。

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我才有点发现自己，我想自己是个描写城市的作家，该隐的子孙。在创世纪，该隐杀了兄弟，被逐出土地，流浪四野，他算是第一个城市人。现在，该隐的子孙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。

我出生在北京，生长于上海，旅行去过世界上将近三百个城市，并描写它们的面貌与生活，城市总是我的描写对象，从上海到圣彼得堡。这些城市对我来说好似一间巴洛克房间里的各种镜子，它们彼此映照，相互证明，重重重复的倒影里最后

映衬出一张真实的面孔。我在圣彼得堡见到了1950年代的上海，在1990年代的上海遇见的，是1970年代的伦敦。这些城市好似一个连环套，当你看懂一个，就看懂了更多其他的。当我在斯特拉斯堡推倒第一张认识城市的多米诺骨牌，1992年的上海便展现出梧桐树下旧房子那通商口岸城市的旧貌。在我的故事里，街道与建筑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相貌，居民的故事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细节，城市历史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，所以，“上海三部曲”其实是一本书，这本书就叫上海。

失去与找到的游戏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，找来找去，这样我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，它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如今，“上海三部曲”（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《上海的金枝玉叶》《上海的红颜遗事》）首版十九年后又回到上海再出新版，回首望去，我满意自己这样地度过了这些日子。这些年，有无数我不认识的读者伴随我成长，给予我鼓励，我感恩自己获得过这么多人在这么多年里安静的阅读，遥远但恒久的陪伴，感恩作家这个职业能获得的纯粹幸福一直都在，其实，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幸运竟降临在我身上。

陈丹燕

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，晴

于上海



1974年,经历了深陷于时代的淤泥与血腥的日子,三十岁的姚姚仍能安静地坐在亲戚家桌前削一只苹果,仍能对生活抱有一些美好的想象,仍能面对照相机镜头用力地微笑。而这张照片,几乎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几张照片之一了。

* SHANGHAI BEAUTY *



CONTENTS



目录

SHANGHAI BEAUTY

-01-

“上海三部曲”总序

-01-

上海的红颜遗事

-260-

附记

幸存者 1

幸存者 2

“请告诉我一些 1944 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吗？最普通的事，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。”我对一生都在上海度过的老人魏绍昌说。

这是距 1944 年五十六年以后的春天。这天下着雨，室内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，屋角的颜色会要深一点，像是纸烟的烟灰，带着点点斑驳。而窗框的影子在墙壁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迹。过不惯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天光里如烟云的柔和，于是也很难体会在带着潮湿雨气的柔和里有很轻的感伤。这种绵长的雨，从来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，也不知道天气预报里预报的春雷会什么时候来，那将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。那是一个合适问到 1944 年的天气。这个老人有很好的记性，他还记得 1932 年日本人炸闸北宝山路上上海商务印书馆那天的情形。日本炸弹炸毁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，大火在宝山路上熊熊燃烧，被烧毁的纸在 2 月的东北风中向市区漫天飘来，像黑色的雪片，而那其实是四十万册中国书，包括近六万册的善本书，以及纸库里准备印书的纸。黑色的纸灰整整落了一天。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，衣服上落满了纸灰。他的脸上在说着这样事情的时候，有着一种类似微笑的神情，他抬着白发斑斑的头。

然后,你就会发现那样的神情原来不是微笑,那是往事无边的忍耐。

他对我想要知道 1944 年的事有点吃惊。

“是为了写书呀。我要写的那个人出生在这一年。”我说。

“想要多知道一点真实的细节,在历史书,在报纸上,在伟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里都看不到的东西,因为我要写一个普通人。”我说。在我的感觉里,她的故事就像沾在历史书上的一粒灰尘一般,但我想要做的是,让她成为一粒永不会被抹去的灰尘。

“是啊。那是需要的。”他说。

1944 年,他是一个二十三岁不到的青年,已经结了婚。他在中一信托公司做职员,虽说是银行职员,但并不需要在上班时穿西装,他大多数时候穿长衫上班。

“是灰色的吗?”我问。

“有时是褐色的。”他想了想说。啊,原来那时的上海青年也穿褐色的长衫。

“1944 年的夏天么,上海是在沦陷中,在沦陷中。南京西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放的全是日本电影,像轰夕起子、高峰秀子和坂东起三郎的电影,也演出中国和日本合拍的《鸦片战争》,因为当时英国是敌对国。你说滑稽吧。”他告诉我说。

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法国租界,已经消失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里,可按照当年法国人的城市规划在人行道边种下的梧桐树,还在一年年地长高。春夏时,它们绿色的、

宽大的树叶以毫不知情的恣肆拼命地长着，遮蔽了整条整条的街道。冬天，等树叶变黄，发脆，成批成批地落下，连在夜里被街灯烤着、最晚落下的那些树叶也全都掉了以后，能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淡褐色的小蛋粘在那里，那是刺毛虫留下的籽，它是翠绿色的爬虫，春天时长大，住在梧桐树上，夏天的时候它把背上的小刺扎到人身上，看不见，可是摸上去，那一块皮肤让人痛痒难耐。夏天，从菲律宾海面上生成的台风会影响上海，台风来的时候，大风大雨把它们从树上扫下来，大人孩子见到了，都恨得用鞋底去碾。它们的体液是黄绿色的，在人行道上小而黏稠的一汪，慢慢干在阳光里，在地上留下了黄绿的、微微泛光的颜色，像打翻的毒药。

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，仍是上海很贵的地段，仍旧留着孤岛时期的浮华之气。街道两边带花园的欧洲式样的房子代表着舒适的生活，街道的下水系统很好，所以不像别处那样，总是湿漉漉的。在那些街区里，白俄经营的面包房、照相馆、西药店、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龙，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、皮鞋店和皮草行，还有饭店，法国人开的咖啡馆、电影院、教会学校和糖果店，上海人开的舞厅、专营西服的裁缝店、报馆、剧团和电影公司，日本文人开的书店，德国医生开的医院，仍旧吸引着喜欢西洋式生活的人们，尤其是那些从外面来上海的人。

“那年夏天已经有了紫雪糕卖，白雪公主牌紫雪糕，像一般雪糕一样厚薄，里面是冰激凌，外面用巧克力裹着。也有卖棒冰的，赤豆的、绿豆的、奶油的棒冰，有人喜欢在夏天吃棒冰，比

较清口。卖棒冰的人把它们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，里面用棉被包着，在沿街卖。他们常常用一个小木块在木箱子上啪啪地拍。叫卖的声音和现在一样，棒冰吃哦，雪糕，就是这种。”魏绍昌老人说。

是啊，我小时候还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在夏天的五原路上，不过那是“文革”中的事了。卖棒冰的人把木箱子的盖掀开来，有一种温和而清凉的气味散出来，带着一点点桂花的甜香，因为在绿豆棒冰里常常加了一点点桂花。那种自制的冰箱没有冰箱的腥气。那个人总是很快把箱子盖上，怕凉气跑了，棒冰还没卖完就化了。

“暗杀。”老人说，“街上常常有暗杀的事发生，有时是重庆派来的人暗杀南京政府的汉奸，有时是汪精卫方面的人暗杀共产党或者重庆方面的人。日本宪兵要捉暗杀的人，就随时封锁交通。这时候气氛马上就变了，让人想到那是个乱世。马路上还有可口可乐招牌，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正广和汽水，那时候叫荷兰水。用玻璃瓶子装的。”是那种厚厚的玻璃瓶，发青的颜色。北京人的食品店里卖酸梅汤，装在玻璃杯里。白俄和山东人在从前的霞飞路一起开了一些小小的俄国西菜社，他们供应的色拉和罗宋汤很得上海人的喜欢，色拉是用煮熟以后切成小块的土豆、煮熟的青豆、切成小方块的红肠和苹果做的，拌了蛋黄酱。罗宋汤则是加了番茄、洋葱和土豆块的牛肉汤，很厚。但在俄国生活过许多年的人，却从来没有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吃到过这样的俄国菜。它们更像是从四马路的番菜馆厨房里

发明出来的上海西餐。

“晚上有防空警报，汽笛一样的声音。听到警报，大家就要把自己家窗帘拉起来，怕美国飞机来轰炸。”老人说。

这我听说过的。在上海逃亡的犹太人所学到的上海方言里，就有一句：“奈电灯隐脱（把电灯关掉）。”过了那么多年，早已离开上海，从美国又回到维也纳定居的杜尔纳还记得它。1944年他住在复兴西路的一条弄堂里，弄堂里的孩子管他叫大鼻子老伯伯。

张爱玲穿着浅红色的绣花鞋经过静安寺明黄色的围墙，她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了。连年的战争，让许多上海市民习惯了在战乱中继续自己的生活，在战争中出生长大的孩子，以为那样的日子，就是日常生活。

7月9日这一天，上海《申报》报道的当日的新闻有：中太平洋敌舰沉毁达五十余艘；塞班岛日军继续展开奋战；敌机再袭九州，又被从容击退，日本土防务固若铁壁；东京等都市决定疏散学童；缅甸富贡前线正展开激战，日军精锐摧毁敌企图；今日防空日训练，交通音响管制，夜间实施严厉灯火管制。

《申报》上的广告，有高尚人士非 C. P. C. 咖啡不呷；有惠罗公司出售夏季精美用品的广告，包括了新式电气冰箱，女士游泳衣，美丽内着衣衫，超等西装领带，儿童夏令衣着和优等香水香粉；还有南园咖啡馆夏令乐园的告示，它在南洋桥中华路，电话是 70219。那一天，在兰心剧院上演《武则天》，在国际大戏院上演《王昭君》。中国旅行社剧团在美华上演《茶花女》，

而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《林冲》。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清心中学和德大助产士学校都开始招收新生。

这一天，1944年7月9日，离霞飞路不远的一条小街上，一家由外国人开的尚负产科医院里，有一个小女孩出生。接生的西医，用一把医用消毒剪刀剪断了女孩子的脐带后，将它结扎起来，再用消毒方纱布将它包好。

故事就从这个女婴还没有张开眼睛的那个时刻开始。一个战时的炎热夏天，小婴儿已经被洗干净了，用医院专门配置给婴儿用的淡黄色爽身粉在大腿和脖子处扑了一些，保持她身体的干爽。这是个普通的孩子，她到这个世界上，像风吹起的一粒尘，风把这粒尘吹到了一块豆腐上，所以我们碰巧就看到了她。我总是想要了解那时的日常生活，那是因为她就在那样的生活里。她安静地躺在漆成白色的小木床上，眼睛真的像桃子那样肿着，从中间裂开一道长长的小缝，长着婴孩的睫毛。那是因为在母亲的羊水里泡了九个月的缘故。那天正好是上海市政府规定的防空日，有时会有防空汽笛响，凄厉高亢的声音，拖着像青衣那样哭天抢地的长腔，透过用牛皮纸贴了米字格的玻璃窗，响彻了整个房间，但她浑然不觉。

最早照顾小婴儿的，是一个护士。在遗留下来的照片中，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不好看的老姑娘，牙齿有些往外龅，眼睛的表情很温顺，因为分得很开，所以像一只出生在江南的小羊的脸。动物和人一样，出生在不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长相。她在这个风气势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过教育，能说英文，她当了



1944年7月9日，姚姚出生在上海尚负产科医院。

单身职业妇女，得以自食其力，不必受勉强嫁人的侮辱。那个年代要成为可以靠自己独自生活下去的职业妇女，不是件简单的事。可在医院的女医生、女护士里，也不算件稀奇的事。她头上戴着产科医院的白色护士帽，那浆硬的白帽子，像是一只精白粉的馄饨。

小女婴是当时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第二个孩子。

上官云珠是一个娇小的江南女子，生得非常美，是那种带着江南小巧玲珑风格的美丽。十八岁时，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带着他们的第一个男孩，随战争难民来到上海。像许多后来在

上海出人头地的人那样，她当初来上海的原因，只是为了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，住进拥挤的弄堂房子，求个太平而已。然后，机会藏在上海小市民充满欲望而又实在本分的生活里，来到她的面前。为了生活，她和上海当时大多数女子一样要出门工作。她到国泰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店去当开票小姐时，名字叫韦均萃，说了一口长泾话。可何老板一眼看出了她的俏丽，他带她走出弄堂，到霞飞路上去买时髦衣服，他把她当成放在店堂里赏心悦目的花瓶。不知道那一天算不算就是上海给她上的第一课，告诉她在这个城市里衣服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意义。此后，精心打扮就成了她的功课。她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在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上，而用来与衣服搭配的首饰，则大多是假的。但皮鞋又是考究的，1948年上海最有名的蓝棠皮鞋店开张，她的鞋子就在那里定做，在蓝棠鞋店里留了自己的脚样子。而后来小女婴从五岁到十八岁弹的钢琴，则是长年租的，家里也始终没有买电视。

几年以后，韦均萃成了上海滩上既能演话剧，又能演电影的明星上官云珠，像有时会在这个充满机会的都市里发生的传奇。她演的第一部戏，据说是一部叫《玫瑰飘零》的粉戏。她演戏认真，渴望成功，为能在当时上海滩的粉戏里出头，她对领路人以身体相报。为使自己在镜头里好看一点，她和别的女演员一样，时不时送时兴的领带、外国香烟和巧克力给摄影师，虽然连摄影师都觉得她没有必要送东西，可她还是小心翼翼。收工早了，她笑盈盈地陪着同事一起去跳舞、吃消夜，连电影公司

打灯光的先生都说她没有明星派头。剧团到外地跑码头时，次次是她出面在江湖上周旋，让戏能一天天演下去。她是一个真正敬业的演员，为了能演到戏，可以付出一切。演到弱女人的辛酸时，她曾在片场上放声痛哭，失去了控制。这便是上海式的传奇，当一堆沙子变成了金子时，谁都知道它们经过了怎样的烈火。那天，片场的戏因为上官云珠的失态拍不下去了，导演很是奇怪上官云珠的脆弱。还是黄宗英过来劝道：“小心把脸上的妆冲坏了。”那时候，受过教育、思想“左倾”、活跃在上海“左派”艺术家圈子里的黄宗英是看轻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上官云珠的，可她还是说出了最体己的话。

许多年后，我遇见过一个非常想要出人头地的女子，独自一人到上海来。自然她是吃了许多苦。有一次她告诉我说，有时她忍不住哭了，就将脸仰平，像点眼药水那样，把眼泪控制在眼眶里：“把脸上的妆冲坏了，更没人要看你！”她说。我不知道那一次在片场，上官云珠是怎样做的。她会像那个女子一样将脸平平地扬起，来控制眼泪吗？她会像点眼药水那样让眼泪倒流回去，保护自己脸上的化妆吗？听说后来，她为自己的失态，专门请导演到家里吃饭，但绝口不谈为什么就这样哭了。

她的眉眼十分俏丽，还有合乎江南人审美的精巧的小嘴。要是把眉毛拔细了，高高挑上去，尖尖的下巴抵在旗袍滚金丝边的硬领子上，就会有上海美女的精明世故的样子，在那里带着一点点风尘气的冶艳和江南小家碧玉的本分。所以她常常被导演选去演上海的交际花，商人家庭的少奶奶，暴发户张